青年研究

在『角落里』『衔接处』看清青年价值观的生成

■ 廉 思

当前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青年群体是国家战略最活跃的变量。新时代做好青年工作，关键在于穿透表象、洞见本质，这种能力有赖于系统的理论训练与扎实的调查研究。

广大青年“似乎无处不在，却又无从把握”，我们是否真正认识到了青年价值观生成的场域？是否找到了青年内心世界的有效入口？如果理论和方法没有跟上青年变化的节奏，研究自然就难以抵达治理的深处。

在“角落里”和“衔接处”看清青年价值观生成的逻辑

观察青年的价值观不仅在于他们在“正式场合”说了什么，也在于他们在日常生活的“角落里”如何生存，在制度“衔接处”如何自处。

“角落里”是青年价值观形成的隐秘场域。所谓“角落”是社会生活中不那么起眼、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在青年问题中它可能包括：制度不易覆盖到的“新就业形态”，如骑手、主播、陪玩等；教育体系的非资源优势层级，如三本院校、职校学生群体等；城市空间的边缘，如合租房、地下室、城乡接合部等；心理与情绪的隐秘角落，如过劳、失眠、焦虑、内耗等。这些“角落”恰恰是价值观生成的“涌动区”。青年的政治态度，除了在课堂教育中形成，同时也在被平台算法裹挟、考公失败遭冷遇、租房被房东克扣的日常生活中逐步沉淀。

笔者的课题组在研究外卖骑手时就发现，很多年轻人并不缺少“奋斗”意愿，但由于劳动过程极度去组织化、去认同化，逐渐转向以“个体求生”为主的生存逻辑。价值观的冷却并非源于宣传缺位，而是源于组织体系的不可达。“角落里”是青年政治态度的“低温区”，却是观察其心态变化的“高密度点”。

“衔接处”折射结构缝隙中的态度变化。“衔接处”指的是制度与制度之间、身份与身份之间的过渡带，是青年从一个社会角色转换为另一个角色过程中所遭遇的“结构缝隙”。例如，从中小城市到大城市求学就业的青年，在返乡、择业、婚恋等多重转换中，频繁遭遇文化冲击和社会排斥。这些人生“拐点”，既是生涯轨迹的转折点，更是价值判断的生成场。

还比如，我们的课题组在对“离校未就业大学生”的调研中发现，那些看似“失败者”的青年的政治态度并不激进，反而一方面希望融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时常感到无力和“被抛弃”。他们不是对制度进行整体性否定，只是对“连接失败”感到无望和无助。

因此，对青年价值观的判断，不能直接贴标签，而是要找到生成机制的观测点；不是靠询问青年“你怎么看”，而是靠分析“你在哪里形成了这种想法”。青年价值观的“动向”不全是在阳光大道上呈现的，而往往是在角落里、衔接处、微关系中悄然发芽。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恰恰是最具观察价值的“前哨”。

在实践中深耕，在理论中生发

青年研究若想避免浮于表面、陷入标签化叙述，就必须依托坚实的理论功底和深入的实地调查。做好青年思想引领工作，本质上也是学术能力的外化。

我们面对的青年群体，早已不是一个可以用“平均数”来描述的整齐划一的集合，而是一个高度分化、深度圈层化、强烈个体化的多元结构体。青年政治态度变迁、就业观念变化、“躺平”与“佛系”心态、青年亚文化，这些看似割裂的现象背后，有没有共通的机制？其中哪些是制度变化的反映，哪些是结构性压力的产物？没有理论框架、没有理论思维、没有机制分析，是难以作出正确判断的。

真正高水平的青年研究，应当是：问题意识明确，理论框架清晰，数据基础扎实，阐释剖析有力，结论可验证可操作。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五个要素：首先，是发现问题。具备高度敏锐的问题意识，识别具有结构性意义和政策价值的关键议题。二是理论驱动。以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基本理论为支撑，通过概念框架界定变量边界，确保问题具有解释深度。三是数据支持。通过问卷、深度访谈、民族志等方法进行扎实深入的调研，获得结构化数据。四是模型建构。从经验中抽象变量关系，构建机制模型，实现学术提炼。五是政策建议。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建议，使研究服务于治理实践。

此外，还要注意概念原创力和理论本土化。真正“报准信”，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理论框架，而应从中国青年的真实生活经验中，提炼原创性概念，进行“实践中的概念生产”。

提供具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思想产品”

新时代的青年工作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领域，理论素养与学术能力不是锦上添花的“附加项”，而是穿透表象、提升认知的“发动机”。研究青年不是“蹲点即产出”，而是“深耕出真理”；不是“讲述若干个体故事”，而是“分析得出规律性认知”。

研究青年必须沉下心来，锤炼理论思维与研究能力。要善用统计工具、调查方法、理论模型，推动从感性描述向理性阐释转化；要注重概念的本土化创新，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具有原创性的本土概念；要多出去与学术同行交流，为党和国家提供具有解释力与决策参考价值的“思想产品”。还要探索学术共同体与共青团组织实践相耦合的机制，让调研成果能够“看得见人、说得出理、落得了地”。总之，在与青年群体的深入互动中丰富感知，在与学术界同行的交流中扩展视野，在与组织体系的对接过程中检验理论。

新时代的青年工作不只是认识青年、讲述青年，而是参与塑造未来、服务国家大局的重要实践。做好青年工作，不能只靠共鸣式的叙述，而要靠具备穿透力的判断；不能满足于“听到声音”，而要追问“生成逻辑”；不能只看“现象热度”，而要分析“潜在趋势”。做好青年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当“速成者”“拼凑者”，更要成为“阐释者”“建言者”甚至“原创者”。而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长期训练的理论素养和扎实系统的调查积累之上。

（作者系中央团校副校长、二级教授）

深刻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大世界意义

■ 彭庆鸿

为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二战之后形成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个战后国际秩序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用无数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二战胜利成果的集中体现。

9月3日上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包括检阅部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之际，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中国、苏联分别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中流砥柱，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决定性贡献。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大世界意义，有力驳斥了“东方战场边缘论”“二战六年论”等错误观点，大力弘扬了正确二战史观。

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为保家卫国，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中国战场逐渐成为东方主战场。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坚持反法西斯战争长达14年之久。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战场持续了不到6年，太平洋战场持续了不到4年，均远短于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持续时间，因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上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争。

作为亚洲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流砥柱。从1931年至1939年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爆发前，中国独立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当时唯一持续、大规模反法西斯的国家。同时期，英国、法国实行绥靖政策，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等小国的利益来换取一时和平，最终养虎为患。美国此间对法西斯侵略采取所谓“中立”政策。从1939年9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苏联等欧洲国家支撑起反德、意法西斯的战争，中国则继续独立支撑反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美、英等国实行“先欧后亚”的作战方法，将主力投入到欧洲战场，此时中国抗战牵制了日军主力。

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抗战，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韧性，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1937年，日本工业产值是中国的4.4倍，钢铁产量是中国的145倍，中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伤亡3500万军民、经济损失6000多亿美元的巨大代价，取得了这场战争的完全胜利。中国军队共毙伤俘日军155万人，占日军在二战中伤亡总数的七成以上。日本投降后，东方主战场接受了128万日军士兵投降，占当时日军海外投降总兵力的50%以上。

支援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紧密联系、相互配合。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打破了日本法西斯“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论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41年年底至1942年年初，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最低谷之时，中国军民给予日本法西斯沉重打击。中国军民英勇顽强的抗战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树立了典范，增强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决心与士气。1942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特别提到，中国人民“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

中国人民的顽强抗击，牵制了日军陆军的主力，从战略上支援了苏德战场、太平洋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牵制了80%左右的日军陆军。这使日军不敢贸然“北进”，避免了苏联被德、日两大法西斯国家夹击，苏联把原计划用于防范日军的几十万军队从东线调往西线，最终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成为二战的转折点。因主力陷于中国战场，也使得日本推迟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依然抗击了一半以上的日军陆军，使日军不能全力“南进”，导致最终在太平洋岛屿争夺中失利。

中国还在情报、战略物资等方面配合了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最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阎宝航，向苏方提供了第一手情报。烽火岁月，苏联向中国提供大批武器装备，中国也向苏联输送急需战略物资，两国携手在大漠戈壁开辟出一条国际“生命线”。

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与战后国际秩序

中国一直为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而不懈努力。早在1937年3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就提到，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立即开展了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外交活动。1942年1月，中国同美、英、苏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宣言》，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也为战后联合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中国是《联合国家宣言》的倡导者，也是4个领衔签署国之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的，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对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牲的英灵、对惨遭屠杀的无辜亡灵的最好纪念。为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二战之后形成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个战后国际秩序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用无数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二战胜利成果的集中体现。

在1943年召开的开罗会议上，中国与美国、英国就建立战后国际和平机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主张该机构应是一个强有力的永久性的机构。1944年，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联合发表了《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确定了未来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内容。1945年4月25日，中国成为《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的国家，也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毋庸置疑，中国是世界战后国际秩序的提出者与积极建构者。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也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5周年。联合国虽历经了一次又一次考验，但仍然充满生机，《联合国宪章》仍然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我们越是要坚决维护好战后国际秩序。

历史虽已远去，但历史真相不会改变，历史功绩不容抹黑。要深刻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大世界意义，必须坚持弘扬正确二战史观，以史鉴今，避免重蹈覆辙。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热点聚焦

构建更公平更可靠的社保安全网

■ 卢 玮 孙娇红

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关乎群众今日的安心奋斗，更坚定对未来的信心。

近期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增强社会保障公平性”置于首位，直指覆盖不全、衔接不畅、待遇不均等核心痛点，有助于为广大群众构建更公平、更可靠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扩大覆盖：织密保障之网

当前的社保体系虽日趋完善，但仍有部分群体处于制度覆盖的边缘地带。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庞大，其参保率尚存在提升空间；社保转移接续痛点尚未根除；部分低收入群体面临“漏保”“脱保”风险。这些都要求社保制度主动延伸和覆盖更多需要保障的群众。《意见》提出的政策举措堪称对症下药：

为了打破地域限制，《意见》指出要“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参保激励约束机制，完善转移接续机制，稳妥有序提高城镇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比例”。这一举措有助于让跨省求职人员减少后顾之忧。接下来需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社保服务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让群众在不同省份间流动就业时所形成的复杂社会网络都能被有效回应，由统一且高效衔接的社保体系来维系其基本权益保障的连续性。

为拥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意见》提出“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制度”并“继续将技能提升补贴申领对象放宽至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因此，应探索建立适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特点的社保参保机制，如推出按天、按单参保模式，降低参保门槛，同时给予政策激励与补贴。这种参保模式设计降低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关于社保缴费的心理成本，提高了其参保的激励相容性，使其能直观看到参保与收益关联，更愿意主动参保。

为了精准加强低收入群体兜底帮扶，《意见》明确要“充分运用大数据比对与实地摸排相结合等方式，加强动态监测预警，及时将符合条件的群众纳入社会救助范围”。具体落实，可以多部门联动并整合民政、人社、医保等大数据资源，及时准确识别低收入群体中的潜在风险对象，确保因疫、因病、因灾等突发困难群众能第一时间获得有效帮扶。对于初入社会且抗风险能力较弱的青年群体而言，这一体系也能更及时地捕捉到他们的困境并给予帮扶，助力他们渡过初入职场的难关。

提升公平性：彰显制度温度

《意见》力促社保体系向公平可及升级，在统一保障尺度方面，它强调“优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设置，合理确定缴费补贴水平，适当增加缴费灵活性，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具体到区域层面，不妨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社保资金的投入与政策倾斜，促进区域间社保待遇均衡化；在行业与职业层面，可整合不同所有制单位、不同行业社保政策，消除身份壁垒，实现保障公平。这种均衡待遇措施有助于打破因区域、行业、职业差异而造成的社会分层固化，有助于创造更公平的职业选择和流动环境。

为了推进服务下沉，《意见》要求“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推动“采取常住地直接提供、跨区域协同经办、完善转移接续等方式”。应当加强基层社保服务站点建设，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理好社保参保、缴费、待遇领取等业务。这些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的关键举措，极大地缩短了群众尤其是习惯了数字生活的青年群体获取社保服务的空间距离，降低了其时间成本，增强了他们对社保制度的认同感和依赖感。

实施智慧赋能时，《意见》提出“推动数字智能技术与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加快信息数据互通共享”。对应落实，建议建立群众就业信息数据库，当发现社保断缴、就业困难等潜在风险时，系统自动预警，实时推送政策措施与服务信息，实现政策主动对接与服务前置化，提高社保政策知晓度、精准度与落实率。

增强发展动能：激发奋斗活力

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其意义远超风险兜底。

一方面，完善的兜底保障使广大群众敢于投身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领域，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社保体系为创业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与风险支撑，有助于保障群众专注于创新项目研发与市场拓展，勇于尝试新的商业模式与技术应用，促进经济创新发展。特别是对于富有冒险精神和创新活力的青年创业者而言，有助于鼓励他们更专注于项目研发与市场拓展，勇于尝试新模式新技术，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另一方面，社保公平还有助于大幅消弭职业身份差异，人们有望依据自身兴趣与专长自由规划职业生涯，在选择职业时并非仅考虑社保福利。这有助于引导人才流向更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岗位，从而提高人才资源配置效率与合理性。社保公平也有助于实现和改变职业选择过程中的决策权重分配，缓解过去因社保差异而导致的职业吸引力不均衡现象，有利于相关群体的长期发展和职业满意度提升。

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关乎群众今日的安心奋斗，更坚定对未来的信心。它为群众提供相对平等的发展起点与机会，减少因突发状况而导致的贫困风险，助力人们依靠自身努力与才能实现职业晋升与收入增长，促进社会阶层良性流动。良好的社保制度增强信任关系，促进交流合作与资源共享，有助于形成有利于发展的社会资本网络，促进公众的职业发展、创业创新等，为社会阶层向上有序流动提供有力支撑。随着社保网络日益完善，广大群众会越来越安心谋发展，从而以更加坚实的步伐，阔步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作者卢玮系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娇红系该系硕士研究生）

思想者观察

促进绿色消费的科技创新视角

■ 张婷婷 钱志权

促进绿色消费，重构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既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加速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绿色消费市场潜力不断释放，重点领域转型取得突破性成果。然而，“成本压力”“知行不一”“供需错配”等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科技创新是破解上述困境的关键力量，通过重塑消费生产系统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范式，有助于为绿色消费发展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

科技创新破解“成本压力”困境

绿色产品往往成本居高不下，亟须通过技术创新重构其成本结构，使其逐步摆脱对财政补贴的依赖，在性价比上建立起与传统产品的正面竞争的技术代差优势，实现从“成本压力”向“竞争优势”的转化。

技术协同降低研发成本。绿色产品的成本压力首先源于技术研发端的沉没成本锁定效应，绿色材料、环保技术等研发投入一时难以有效降低，加之规模效应有限，相关企业常常陷入“投入越多，单件成本越高”的困境。必须打破不同技术领域的创新协作壁垒，构建开放式研发数据库，推进技术设施共享，形成技术升级的连锁反应，从而降低单次研发的边际成本，进而在规模化生产后持续摊薄总成本，最终使绿色产品在价格上具备与传统产品竞争的能力。

全链条优化降低生产成本。生产环节中设备空转、原料浪费、维护低效等问题，加重绿色产品的成本负担。可构建全产业链的生产计划，利用物联网传感器实时追踪原料损耗，依托人工智能算法动态优化设备能效，精准溯源材料流向。通过贯穿产品生产链的数字化改造，确保每个环节的成本损耗均可转化为可量化的技术改进指标，最终实现从源头到终端的生产成本压缩。

智能供应降低管理成本。绿色企业需耗费大量资源进行跨层级数据核验与人工协调，以确保各环节合规；同时，低碳物流规划缺乏动态决策依据，难以精准平衡运输成本与环境效益。智能供应链技术可系统性重构管理范式，智能生成供应商分级清单，提升绿色合作伙伴的筛选效率；还可整合交通网络、能源设施等动态数据，构建物流路径仿真系统，在运输效率与碳减排目标之间找到最优解决方案。

科技创新克服“知易行难”堵点

绿色消费“知易行难”的实践困境，其根源在于价值传递链的断裂。亟须借助技术赋能，在需求端构建起“价值显化、行为引导、内生激励”的完整通路。

虚实融合重构绿色价值认知。可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整合绿色产品的碳足迹、资源循环图谱等生态参数，将抽象的环境成本转化为可视化的动态模型，同时借助增强现实技术搭建沉浸式交互界面，使消费者直观比较不同产品的“含绿量”。还可借助元宇宙技术构建虚拟社区，将绿色消费理念的传播从单向灌输转变为体验式渗透，通过群体行动激发绿色消费的内生动力。

智能决策降低行动转化门槛。消费者需处理绿色产品的各类信息，必须构建智能推荐系统，依托用户画像和历史行为数据，动态匹配最优绿色消费方案。同时，建立个体碳账户系统，将碳积分兑换、生态补偿等激励机制嵌入交易流程，自动核算碳减排量并触发积分奖励，形成“选择即收益”的正向反馈回路。

区块链加固市场信任基础。创建不可更改的“绿色数字身份证”，有助于实现绿色产品环境绩效的可量化、可验证和可追踪；构建基于多节点共识验证的智能合约体系，利用分布式账本促进绿色标准的持续更新，加强绿色产品市场信任机制，最终将促使绿色消费从政策推动转变为自我驱动。

科技创新缓解“供需错配”矛盾

传统供给体系难以有效响应动态多变的绿色消费需求。亟须借助数据驱动、柔性制造和数智技术，构建供需精准对接的弹性体系，以破解“经验预测和动态需求、规模生产与个性需求、城市产能过剩和县域供给不足”等结构性矛盾。

算法模拟推进“以需优产”。构建数据驱动的实时供需连接系统，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实时捕获用户行为数据，结合机器学习算法解析绿色消费需求，消解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资源错配。这种“以需优产”的动态响应模式，不仅将消费者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保诉求转化为供给侧的创新导向，还以技术手段从根本上降低了绿色消费的系统性损耗。

柔性制造实现个性表达。通过模块化设计和标准化接口，可使绿色产品随需求变化进行功能重组，既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表达的需求，又通过功能迭代延长了绿色产品的全生命周期。

数智技术强化城乡联动。构建城乡联动的智能调度系统，运用物联网技术建立产能地图，并通过深度强化学习算法动态优化仓储布局与物流路径，将城市相对过剩的绿色产能智能匹配至县域潜在需求节点。同时，部署分布式智能终端设备，在县域商业体系中嵌入具备需求感知功能的交互终端，结合边缘计算技术，实现本地化绿色需求的即时解析和快速满足。

（作者张婷婷系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钱志权系该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